

声音

杭州办亚运不必“羞羞答答”

■刘颖余

时代真是不一样了。杭州拿到2022年亚运会举办权,这消息要是搁在20年前,绝对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会被媒体大书特书,但今天,媒体的报道一带而过,其关注度甚至都敌不过黄博文的世界波和C罗的帽子戏法;国人的喜悦也是节制的,网络上依然有许多绵绵不绝的反对声音。

这并不可怕,亦属正常。对于一个举办过一届夏季奥运会和两届亚运会的体育大国来说,亚运会提不起国人多大的兴趣,无须大惊小怪。何况,杭州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申办成功的。没有悬念,也就没有情绪上的刺激。人们平静地接受杭州的喜讯,是一种曾经沧海的淡定,反映了国家在体育发展上的不断进步和国民在体育观念上的变革。

最重要的是,在国内一度迷失的办赛热潮中,人们厌倦了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办赛方式。反对杭州举办亚运会的声音,也多是从这方面考虑的。有趣的是,就连杭州方面也一度“羞羞答答”。从去年11月到今年8月,杭州体育局居然对于申办一事两度“辟谣”。直到今年8月17日,中国奥委会正式向亚奥理事会递交申办意向书,人们才发现,申办由“内部讨论”变成了公开的现实,“谣言”原来是真的。

中国应不应该再办亚运会?杭州可不可以办亚运会?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亚运会在当下的发展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无论是关注度还是商业开发都令人堪忧,越南弄办2019年亚运会,临时让印尼接手,更是有可能使亚运会陷入恶性循环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申办亚运会,不仅是亚奥理事会的期待,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的担当和责任。韩国和日本都多次举办亚运会,就连体育实力一般的泰国也曾四度举办亚运会。中国作为多年的亚洲体育“老大”,才三次举办亚运会,多乎哉?不多也。

至于为什么是杭州,而不是别的城市

来代表中国第三次承办亚运会,中国奥委会自有其考量标准。杭州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和自然环境、良好的基础体育设施,杭州正在为建成一座开放性的智慧城市而努力,这和亚运会的理念一拍即合。当然,杭州较少举办综合性运动会,是其最不利的因素,但在2022年前,杭州将举办2016年全国大学生中学生运动会、2018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和2020年全国农民运动会,杭州为亚运“练兵”可谓机会多多,而且,国内其他省市经验丰富的办赛团队届时亦可驰援,所谓办赛经验对杭州来说其实不是多大的问题。

杭州继北京、广州之后接亚运接力棒,可喜可贺,这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和城市形象的宣传将不可低估。一届体育盛会改变一座城市的例子不胜枚举,巴塞罗那、首尔、北京都是好的榜样。杭州,同样迎来这样美好的机遇。

当然,杭州面临的挑战同样艰巨。和北京、广州相比,他们有后发的优势,但处在更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着奥运改革和亚运转型的新要求。因此,杭州举办亚运会应该学习北京和广州的经验,但却不能一味因循。他们在筹办过程中应坚持以运动员为本,而非官员为本;考虑来宾和国际社会的感受,更要考虑市民的感受;要赢得国际社会的称赞,更要赢得当地民众的口碑;在安保方面要重视,但要“举重若轻”,谨防“用力过猛”;在志愿者服务方面可以追求美丽新鲜,更要尊重专业精神,保证志愿者队伍有质有量……做到这些,自然远非易事,需要东道主从现在就开始精心谋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概而言之,像亚运会这样的大赛从来就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的问题。只要观念正确,措施得力,杭州完全可以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亚运盛会,实现办赛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2022年,北京办冬奥,一定会大张旗鼓,杭州办亚运,似乎也不必“羞羞答答”。

■本报记者 袁浩 文/图

9月17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的比赛场地旁边坐着一群衣着正式的观众,其中不乏名人,如前中国女排主教练、现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的陈忠和,他们的到来让平时少人问津的体操馆热闹了许多。

据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介绍,他们是来自地方体育局体操中心的主任和主管体操项目的领导,此次来到北京,是为了观摩一场内部测试赛,并投出手中的选票,选出参加下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体操世锦赛的阵容。

场上12名男队队员,除了张成龙、林超攀、邓书弟等参加过南宁体操世锦赛的选手,其他队员并不为人熟知,“现在男队和女队的阵容都变了,男队参加过奥运会的只剩下邹凯和张成龙,女队全部是新人。”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告诉记者。

伦敦奥运会之后,陈一冰、程菲等名将相继退役,中国体操队进入新老交替,如今,一批新人走上前台,中国体操队开始向下月的世锦赛,以及明年的里约奥运会发起冲击。

女队后备加强

“我们不能总是这样紧巴巴地过日子。”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在去年的南宁体操世锦赛上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体操女队当时面临的困境。

自伦敦奥运会之后,中国体操女队出现了大面积的更新换代,然而到了2014年,面对接踵而至的仁川亚运会和南宁体操世锦赛,由于参赛年龄的限制,女队却不得不面临人手紧缺的尴尬现实,最终只能让一支队伍连续征战两项大赛。

今年,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在9月15日举行的女队内部测试赛上,A、B两组的人员加起来有14人之多,除了商春松、谭佳薪、黄



女足新帅上任

9月18日,在陕西省渭南市备战友谊赛的中国女足宣布,法国人布鲁诺·比尼成为球队新任主帅。据了解,布鲁诺·比尼曾在2007年至2013年执教法国女足,率领球队分别闯入德国世界杯和伦敦奥运会四强。图为布鲁诺·比尼(左一)在场边观察中国女足训练。 CFP供图

度过了一段“紧巴巴”的日子,这支队伍新人不断涌现,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氛围——



慧丹和白雅雯等选手,其他队员的名字均显得十分陌生,但是她们的表现却毫不逊色。“毛艺、范艺琳这些过去不太受关注的小队员,上得非常快。”黄玉斌说。

年轻选手不断涌现,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竞争氛围。“过去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

中国体操

相较于女队,中国体操男队的后备人才状况要好一点。去年,由邹凯和张成龙分别领衔的两支队伍,兵分两路参加了仁川亚运会和南宁体操世锦赛,并且战绩不俗。在9月17日的男队测试赛上,奥运“五金王”邹凯并没有出现。黄玉斌告诉记者,邹凯跟随队伍在天津蓟县完成了一个多月的封闭集训,但是由于在备战北京和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的腰已经有些问题,属于劳损性损伤,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所以并没有参加本次测试赛,“我们会和他一道做好备战明年里约奥运会的准备。”

如今,在这支以新人为主的男队中,需要邹凯这样的老将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更需要关键时刻,他能在单杠和自由体操上为中国队争取更多的分数。在前两届奥运会上,男队每一个单项都有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的运动员,如陈一冰的吊环、李小鹏的双杠、邹凯的自由体操,当他们退役之后,除了刘洋在吊环上填补了陈一冰离去之后留下的空白,男队在其他项目上缺乏拔尖的选手。当《工人日报》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黄玉斌的时候,他连连摇头说:“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虽然单项高手较少,但是在全能型选手方面,男队涌现出了邓书弟和林超攀等人。在本次队内测试赛上,很多队员都参加了全部6个项目。“全能型选手能够提高一支队伍的整体水平,让我们在备战的过程中面更宽一些。”黄玉斌说,“整体而言,这次测试达到了预期效果,当然在一些细节上还有提高的空间,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但我们仍然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追求。”

根据安排,中国体操队将于10月8日出发前往法国国家训练基地进行世锦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之后,他们将前往英国参加于10月24日举行的体操世锦赛。

《奥林匹克2020议程》在2024年奥运会申办过程中的成功实践,令奥运会申办再度焕发热情——

奥运会申办“云开雾散”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本周,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正式宣布,布达佩斯、汉堡、洛杉矶、巴黎和罗马5座城市将竞争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波士顿和多伦多等有意申办城市的先后退出,并未令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遭遇困境,这正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力推奥运会申办改革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改革重燃奥运魅力

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创办以来,奥运会逐渐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盛事之一,如果说奥运会遭遇“生存危机”,想必很多人会感到不可理解。然而,奥运会规模的日益庞大使得筹办经费越来越多,给举办城市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因为经济压力首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这届奥运会出现超过1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为期15天的奥运会令蒙特利尔不得不负债20年……

国际奥委会随后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创性的商业化运营

持续发展仍需后劲

如果说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是国际奥委会《2020议程》的一次完美实践,那么此次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便是国际奥委会全面推行改革举措的新起点。在正式确定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后,国际奥委会宣布:为响应申办过程良好管理、透明与道德的承诺,国际奥委会不仅首次在申奥开始阶段便发布了涉及申奥程序的所有文件,还将为5个城市的申办组委会提供总计17亿美元的现金和服务支持。



在2024年奥运会5座申办城市确立后,主席巴赫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接受专访。路透社

模式,使得奥运会的经济形势得到大幅改观,奥运会也一度被视为推动举办城市发展的经济引擎。但过度商业化又使得很多奥运举办城市陷入“奥运后遗症”,在奥运会结束后都不不同程度出现场馆闲置、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问题。例如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投入超支56%,总计花费超过100亿美元建造体育馆、滑雪跑道和铁路等设施,但场馆设施的闲置和高额维护费用,使得长野在奥运会后一度出现经济衰退。

近年来,奥运会不断高涨的承办费用更是令不少潜在申办者望而却步。高额的办赛成本以及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让不少城市不再对奥运会青睐有加。

在2016年夏季奥运会申办过程中,日本札幌和美国旧金山先后退出申办;2020年夏奥会,有意申办的意大利罗马又因为财政危机主动退出;2022年冬奥会申办,挪威奥斯陆等4座城市又接连退出……

目睹奥林匹克运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奥委会在巴赫上任之后力推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便是重新激发人们对于奥运会的申办热情。被视为国际奥委会自1999年之后最重要改革纲领性文件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总共40条建议中有3条是有关奥运会申办改革的内容,包括变“申办”为“邀

特稿

纪律处罚、裁判职业化、联赛工资帽等制度的修改和规划,让CBA联赛在职业化道路上稳步迈进——

“三板斧”保驾CBA



■本报记者 郎成

随着CBA联赛新赛季的日益临近,CBA联赛委员会于本月初在上海召开了常委会会议。会议上,关于纪律处罚、裁判职业化、联赛工资帽等一系列制度的修改和规划,将成为联赛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而这些已经推出和正在研究阶段的举措,能否坚决有效地付诸实践,对于一直强调调职业化道路的CBA联赛来说,无疑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纪律处罚：推出“郭士强条款”

出台原因：

在上赛季辽宁对阵广厦的季后赛中,辽宁队主教练郭士强因不满裁判判罚而被罚出场,并且拒绝离场。此后,中国篮协做出对其停赛处罚。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郭士强虽然没有坐在教练席上,却以辽宁省篮管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坐在了球队席的边上,间接指导比赛。此举被看作是钻了纪律处罚规定的空子。

新规内容：

事实上,根据《CBA联赛纪律处罚规定》要求,被取消比赛资格的人员,“应前往该队的休息室,并在比赛期间留在那里,或者离开体育馆”。CBA联赛办公室负责人向《工人日报》记者坦言,以往在规则执行方面确实存在不够严格的情况,仅是要求该人员离开工作岗位。

在此次被一些媒体称作“郭士强条款”的规则修改中,明确指出,教练员、运动员、球队席人员、俱乐部工作人员若被停赛,在比赛期间不得出现在内场及观众席,如违反规定,且不停劝阻,将自动延长停赛一场。

此外,对于联赛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俱乐部高层人士,规则规定,如出现不服从判罚、干扰比赛、干扰裁判员工作等行为,将会被终止联赛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或被建议不参与球队的管理工作。而且新赛季,对阵双方的球队席还将被两台高清摄像机监督。这些规则的修改,被认为是针对上赛季在与北京队的比赛中大闹赛场的佛山队总经理刘宏疆。



联赛工资帽：仍在酝酿之中

出台原因：

近年来CBA各支球队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尤其是今年夏天的李根转会事件。从一开始被爆出新疆队3年2200万元的报价,到亚篮联官网报道的新疆队拿出3年490万美元(约人民币3000万元)的天价合同,再到新疆队说年薪不到1200万元。北京队以800万元工资加奖金续约未果,尽管最终李根的身价依然是个谜,但球员疯涨的薪水还是让不少球队感到负担越来越重。

未来规划：

推出《CBA工资总额限制条款》,俗称“工资帽”。CBA联赛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款的出台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过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开始,讨论稿已经成型,“在相对好操作的时候,会尽快推出”。

该负责人透露,“工资帽”的实施,将要求各俱乐部在每个赛季前注册时,上报上赛季俱乐部的工资总额。CBA联赛办公室汇总后,从而拟定新赛季的“工资帽”。每个赛季的“工资帽”将在各俱乐部工资总额平均数的基础上,上浮一定的百分比。

据了解,酝酿之中的CBA“工资帽”也会效仿NBA的“工资帽”,存在超出部分的“奢侈税”和一些特殊条款。例如,允许每个俱乐部有1至2名老将工资的50%不计算在超出“工资帽”的部分当中,并且个别俱乐部由于地域偏远,不利于吸引球员,其工资总额可以在工资帽的基础上适当上浮。(CFP供图)

